



人大重阳

# 研究动态

责任编辑：胡海滨

审核：王文

邮箱：rdcy-info@ruc.edu.cn 联系电话：010-62516305

网址：http://rdcy-sf.ruc.edu.cn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第 7 期

2013年8月8日

## 中国在莫斯科 G20 峰会上的角色与利益诉求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G20 系列研究报告》之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 贾晋京

2013年莫斯科 G20 首脑峰会有三个值得重视的背景：一是金砖五国于 2013年3月建立了非布雷顿森林框架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分别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此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框架虽然不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在模仿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对话机制，G20 与金砖五国的关系如何协调，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是在国际金融秩序方面，伴随着五年来的经济危机，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执行战略收缩。战略收缩不是在全领域都收缩，而是有缩有保。哪些缩，哪些保？本质上，G20 首脑峰会机制的出现是根据“美国议程”，为维系美元主导下的全球金融秩序服务的。但这一进程面临着美国需要跟其他国家相互协商，减少矛盾以实现“平稳过渡”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战略收缩就是美元的“势力”收缩过程，也就是一个需要人民币去“填补”其留下的“势力真空”，中国需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商机制。

三是在全球宏观经济方面，西方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纷纷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成为全球经济动荡的根源。应对这一问题，仅仅倡导各国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是不够的，需要的是一个统筹各国财政、货币以及宏观监管政策的“大金融合作框架”。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中国在 G20 的利益诉求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 第一 推进大金融合作框架建设

G20 首脑峰会和财长会议曾多次重申各方应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携手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竞争性货币贬值却愈演愈烈，我们认为，这与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切实可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有关。要避免各国刺激增长的国内政策演变成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仅有货币政策的对话机制是不够的。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对全球复苏的损害，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大金融合作框架，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该框架还应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相互协调机制及监督机制。

坚定不移刺激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各国应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协调，保持政策导向总体一致性、时效性、前瞻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举措，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上多下功夫。

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

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要平衡和兼顾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影响，切实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

金融监管方面，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监管应与微观审慎监管紧密结合，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应统筹协调；信贷政策方面，应坚持市场化调控原则，提高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

加强沟通和协调，努力形成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政策措施，妥善化解主权债务、跨境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等金融风险，控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效



缓解全球通胀压力，避免各国经济政策效果相互抵消。

## 第二 出台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路线图

国际金融组织改革不仅涉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关乎国际金融秩序的公正化、合理化，也决定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来。先前的 G20 首脑峰会与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多次提出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建议，并设定过一些具体目标，但从未提出过改革的最终目标及路线图。

当前的国际金融组织框架与运作方式依然保持着战后初期的模式，反映的是少数西方的国家的利益，这与当前新兴市场国家贡献了大部分全球增长份额的现状不相适应。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应以实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平话语权为目标，以各参与方权利义务平衡为原则，设定实施路径并制定时间表，要做到简单易行、便于问责。

应该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

要强调国际监管核心原则和标准的一致性，同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差异性，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责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



### 第三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随着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相对下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缺乏内在稳定性，成了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阻碍因素。确保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必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需要在国际储备体系中增加非美元货币的储备量，促进各国央行官方储备货币币种构成比重与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使用量与双边贸易相挂钩。倡导各国央行间货币互换操作常态化、机制化。

推动非美元货币的跨国清算支付体系建设，使非美元货币的国际流通渠道顺畅、操作规范。

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各方应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可供操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创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

### 第四 促进 G20 向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转型

推动 G20 国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从临时性论坛转为常设国际机构。在全球经济转向复苏的关键阶段，



各国间迫切需要一个协调从宏观到微观政策的“大金融”合作框架。目前，WTO、IMF 等国际组织在各自领域承担着国际政策协调机构的作用，但可以协调各类经济议题的首脑级常设协调机制尚不存在。G20 发挥着就各类经济议题召集对话的平台作用，但缺乏实际执行机制。因此，G20 机构化、职能化亟待推动。

实现机构化、职能化有利于 G20 的作用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

要加强 G20 国成员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合理政策力度，审慎稳妥把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节奏、力度，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

要处理好 G20 机制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关系，确保 G20 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 第五 合作发展实体经济，共同走出危机

全球各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经验充分表明：如果金融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导致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特别是当产业投资的机会成本变得要由金融交易来确定时，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投机逻辑最终压倒了生产逻辑，金融资本驱逐产业资本追求自我扩张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的过程。

要想走出危机，除了需要强调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外，还需要强调：实体经济发展也需要合作，唯有加强合作，增加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一个业已全球化的世界才能共同走出危机。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



只会损人不利己，在造成全球经济混乱的同时也给制造流动性泛滥者带来经济萎缩！

应该大力推动国际新兴产业合作，积极培育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应该大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G20 各国应该重点关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融资、财税等手段帮助它们尽快摆脱困境，为各国经济复苏提供坚实支撑。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充分挖掘科技潜力，积极培育增长亮点，增强经济复苏的内在动力。同时，各国应该加快各自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努力实现世界经济相对平衡增长。

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定增长。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既是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也是实现世界繁荣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应该在这方面多想办法、多出政策。

总之，在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经济体系深陷危机的背景下，G20 取代 G7 成为国际经济对话主要平台本身就是西方国家有求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反映，这是由新兴市场国家取代西方国家成为全球工业经济重心所决定的，就算西方国家真的会“复苏”也不会动摇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因为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会因西方国家“复苏”而降低。

2008 年发生的金融海啸及其后的经济萎缩实质是全球化危机，是经济全



球化自由无序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现象。西方国家借贷支撑消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主导投资的增长方式逐渐导致了生产与消费、投资与需求的地区错位，并且最终造成了由信贷过度膨胀导致的金融危机和由投资过度膨胀导致的生产危机。由此，中国在 G20 平台中的地位不难发现其实是新兴工业国家的代表，一方面是“金融压倒工业”的西方国家迫切需要的工业国家对话方，另一方面是其他新兴市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G20 对中国来说，是有机会打破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寻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首要国际舞台。与中国对于中美的“G2”框架并不认同的态度不同，对于 G20，中国一贯表现出高度重视，中国需要这个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常态化沟通机制。